

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

—法国的历史与现实

白夏

(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法国)

摘要: 公共知识分子的需要和存在就隐喻了真正的公民社会尚未到来, 当社会已经迈入理想的公民社会, 即公民已经不再需要他们的代言人—公共知识分子时, 公共知识分子就会退出历史舞台。当然这个黄金时代越早到来越好, 也许永远也不可能到达。因此当下社会是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 需要他们对违反社会正义的事件进行关注和批评。换言之, 捍卫真理和坚守正义应该公共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

关键词: 公共知识分子, 马克思主义, 专业化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法国自 1944 年 8 月解放以来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历史与现实, 是一个值得中国知识分子反思和借鉴的经验。法国和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意识非常类似, 虽然历史背景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最近 50 年中国和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有很多共同点。知识分子在法国的兴起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当时的一些从事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自称哲学家(philosophes), 最典型的是伏尔泰。他当时参与的一件事情是公共知识分子产生和进行话语表达的标志, 这就是卡拉斯(Calas)事件。这是一起充分展示知识分子性格和社会角色的事件。卡拉斯是基督教徒, 当时法国占主导地位的是天主教。18 世纪这两个教派矛盾很激烈, 因此情况很复杂。卡拉斯的儿子想加入天主教, 但突然死亡了。卡拉斯宣布他儿子是自杀的。但警察不相信他的说法, 并且认定是因为他儿子想加入天主教, 所以被卡拉斯杀死的。卡拉斯因此被逮捕和处决了。卡拉斯死后, 他太太到处求助, 想为他丈夫平反。刚开始伏尔泰对此无动于衷甚至还语带讽刺。但是当他听完卡拉斯太太的当面陈说后, 他觉得警方的行为违反了公平的基本准则。他介入了这件事情, 主要的方式是给当时的法国王妃, 俄罗斯皇后, 普鲁士国王等名流写信。同时他公开发表了很多文章, 在里面宣布基于正义和公平, 卡拉斯必须得到平反。由于他的努力, 一年后也就是 1770 年卡拉斯事件终于得到平反。这件事情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第一次发挥他的作用和功能, 即代表正义反对不公平的事情, 当然这个群体的社会身份还不是叫做知识分子, 叫哲学家。

知识分子概念的真正确立是在 1898 年。在这一年发生了著名的德雷弗斯事件。德雷弗斯是法国军人, 具有犹太血统, 被控告背叛祖国和出卖国家机密, 并被当局判处徒刑。德雷弗斯是法国东部阿尔萨斯人, 其实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在被审判后没有上诉, 因为他认为服从是军人的天职。这个事件被公布后, 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法国作家左拉觉得这一切对德雷弗斯太不公平, 认为判决其叛国罪是没有根据的。他写了一封给法国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刊登在当时的著名报纸《震旦报》上。在信里左拉宣称: “因为这一判决违反正义和真理, 我要求给德雷弗斯平反。” 这封信影响广泛, 不仅仅是知识界连整个法国都卷入了这一事件。当时很多教授、作家等左派强烈要求重新审判德雷弗斯事件。同时, 所谓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如巴雷斯(Maurice Barr)等公开表示支持军方决定, 认为左拉是意大利血统不可能爱国。并宣称左派反对军队是叛国的行为。在此期间, 巴雷斯创造了知识分子这个名词, 当时的含义就是不爱国的左派, 是一句骂人的话语。对此, 左拉说: “我就是知识分

子。”因此知识分子在最初是专指左派知识分子。在德雷弗斯事件中，不是议员，而是公共舆论起了关键作用。知识分子通过媒介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进而向政府和军方施加压力。这是 20 世纪公共知识分子的具有普遍性的行为模式，一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1945 年以后，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 1945 年到 1980 年或 1985 年（以萨特或福柯的去世为划分标准）。这个阶段是法国知识分子发展的黄金时代，当然其间也掺杂了一些曲折。1949 年后右派知识分子因为曾经与纳粹合作丧失了话语权。50 年代的一个焦点是阿尔及利亚事件。当时有 100 多万真正的法国人滞留在阿尔及利亚，历史背景相当复杂。右派和一部分左派政治势力支持法属阿尔及利亚政权，法国共产党也宣布虽然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解放运动，同时也维护法国的国家利益。1954 年战争终于爆发。法国实行义务兵役制，法国军人在阿尔及利亚杀人、审讯，为所欲为。其时，没有一个政党敢于干预这件事情。1960 年 9 月，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知识分子介入了，并且在当时的《快报》周刊发表了《一二一宣言》（121 人联合签名），反对法属阿尔及利亚殖民政权。他们宣布作为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有着人权传统的祖国在阿尔及利亚镇压人民解放斗争。他们要求所有当兵的法国人起来反抗军队的行为。当时很多年满 18 周岁按照规定必须服兵役的年轻人将义务兵役信撕毁了。很多知识分子为阿尔及利亚的人民募捐，他们常常提着箱子到处争取捐助。因此当时的知识分子被称为“提箱子的人”。比较德雷弗斯事件和阿尔及利亚事件，法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特点是非常鲜明的。首先，他们都是宣布其行为是为了捍卫真理和正义，他们代表着法国社会的良心。其次，知识分子的对象都是法国军队。最后，知识分子的行为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他们被指责背叛祖国，是国家的叛徒，而他们自己认为只有他们才真正代表了人权的法国，是法国的荣誉而对方是法国的耻辱。

从 1960 年代初到 70 年代，是法国公共知识分子最激进化的时期。1968 年的五月风暴的主要目的是批判资本主义，左派知识分子开始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曾经支持共产党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因为其在阿尔及利亚事件中的行为而反对法国共产党，要求真正的革命。他号召学生和公民反对现行制度。1968 年底萨特和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开始支持“毛主义”，也有托派支持者。《人民事业报》两个社长被捕以后，萨特担任社长，政府便不再批判该报纸。可见当时著名知识分子的地位。当时知识分子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前的发挥特殊作用转变到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成为人民的普通一员和积极分子，应该为人民服务。所以当时的萨特直接走上街头发传单，知识分子以普通人的名义参与社会运动。可见知识分子的作用形式发生了变化。包括福柯、德里达和萨特等知识分子都在发传单，支持革命运动。1975 年法国翻译出版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让法国知识分子开始反省自己的行为，并且真正理解了共产党苏联制度如何镇压人权，不让反对势力存在，是一种没有自由的极权制度。萨特通过阅读《古拉格群岛》发现他自己误读了共产党制度。

越南战争结束后，几十万害怕越共迫害的“船民”（难民）流亡国外，无家可归。法国从 1974 年开始实行严格的反移民政策。为了这个缘故，萨特登门拜访他的老同学和“论敌”——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雷蒙·阿隆，说服他一起联合要求法国总统敞开法国大门，解决越南难民问题。萨特呼吁公共知识分子远离政治，重新回到德雷弗斯时期。知识分子还是应该代表社会良心，捍卫自由的原则，维护人权传统，而不是陷在各种主义的泥潭里。结果他们的要求得到了实现，1975 年，法国接收了 20 万难民。这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巅峰，也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死亡。

1980 年代以后社会党候选人被选总统以后，公共知识分子虽然支持执政，但也不参政。社会党也要求知识分子的支持。但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宁愿留在体制外发挥其影响力。他们从萨特的事件得出了深刻教训：即代表社会良心的大知识分子萨特都会因为盲从而犯下大的历史错误，知识分子不能与政治太接近。与此同时，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形象也急剧滑坡，

社会民众开始对知识分子不以为然。总的来说，知识分子的专业化越来越重要，哲学家风格的知识分子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已经不再进入公共领域，而是他们的介入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比如南斯拉夫问题，不是由一般的知识分子来讨论，也不是由哲学家来考虑，而是由专门研究南斯拉夫问题的专家来探讨。这些专家知识分子的合法性不是像以前来自他们所代表的大良心和大原则，也不是为了捍卫真理，而是源自科学。他们在专业之外的影响很小，但是一旦进入专业领域，他们就能够对政府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现在的法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们越来越少地关心法国问题，而更多地讲世界各国的问题，所以报刊发表很多苏联专家、中国专家等的文章。比如前几年的关于移民人在法国牵涉到黑户口的三无运动的合法化问题，就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各种专家，通过专业委员会发挥作用。当然一些作家，导演也发表意见，但他们的影响不如以前那么大。所以可以说以前的知识分子是从大良心、大原则出发的公共型知识分子，他们是通过过媒介制造舆论进而影响政府行为，而不是通过制度渠道等建制化的方式（比如建立政党等）。现在法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参加政府建立的专业委员会，借助报刊电视发挥其影响力。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然法国也有所谓的媒体知识分子，但他们与法国历史上的大知识分子比较起来是“小人”和君子的区别。

知识分子的观念变迁与当时的政治制度、时代思潮和社会背景等元素密切相关。公共知识分子建基于原则和良心对社会和政府进行批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代民主社会的议会制度是一个基本建制，它给代表不同利益的议员们一个发生冲突和寻求妥协的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利益和原则并不是绝对统一的，而是可以发生背离的。可以说，一个拥有成熟议会制度的民主政府也很有可能支持和践行一条违背正义价值的道路。阿尔及利亚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发生了合法性危机，其社会功能也受到了普遍怀疑，他们反对政府的话语和行为也就丧失了一个能达成普遍共识的厚实理据。

二战结束后是一个社会背景相对不那么复杂的时代，在民众遭遇重大心理创伤的社会境遇里，基于纳粹的反犹太人等反人道的残酷性，政府和民众形成了历史共识：人权是一个普遍和不可侵犯的原则。因此，提倡和呼吁良心和人权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成为了政治集中的公共领域的重要社会角色，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尚未构成对建构公共领域的威胁。所以，在这个历史阶段，公共知识分子的典型是象征良心和道德的哲学家，而不是技术专家。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机构日益繁荣，高等教育迅猛发展，知识发展进一步分散化和专业化。与此相伴的是政治明显地向具有专业色彩的技术科学发生变迁，竞争和博弈成了政治游戏的关注焦点。可以说，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后政治时代。公共领域日渐式微，公共知识分子普遍失语。扮演重要角色的议会重视的是专业委员会的专家和官员的意见和建议，公民的声音和态度很难通过建制化管道被体制所采纳。职是之故，公共知识分子的舞台和空间日益窄化，其实就是边缘化。在一个现代社会里，所谓民主就是公民可以通过制度渠道参与公共领域的建构，并且对政府的决策能够参与和发挥影响力。当然相对于历史上左拉、萨特等大知识分子的状况，人们可以认为当下的公民政治代表了历史进步的趋向，即从精英政治的独白向公民政治的对话发生转变。但问题是现在的社会“大良心”和“小良心”都没有，公民政治成了政治摆设。换言之，在科学化和技术化的后政治时代，公共领域有沦为专家的“私人领域”的危险，这是极其可怕的发展模式，与极权政治只有一步之遥。无论是曾经有过民主历史 and 没有民主历史的国家，在这样的公民无法参与民主建构的社会形态里，所谓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都是一个令人怀疑的命题。

当代社会的主要困境在于普世理念在解释世俗社会时已经丧失了它曾经具有的有效性，众声喧哗的结果就是共识的弱化和缺席。即使如此，我认为，一个现代民主社会必须通过制度设置的方式建立能够保障基本权利的社会制度，人权和自由应该成为社会不证自明的基本预

设并被纳入建制化过程。讨论和对话应该成为形成新的知识的途径。人性是社会的道德基石和基本原则,尽管当下的专业知识分子可能规避历史上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胡言乱语”所造成的社会恶果,但是如果他们因为强调专业而忽视了对人性的剖析和重视,忽视对人的基本境遇的洞察和考量,那么他们的专业的合法性就很有可能遭到来自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和挑战,因为在多元化和碎片化的现实社会,科学的真理性已经不是不容置疑的。那么,如何通过话语方式和表述风格的转换,使专业知识分子向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置换成为可能,这是一个值得知识界思考的问题。公共知识分子的需要和存在就隐喻了真正的公民社会尚未到来,当社会已经迈入理想的公民社会,即公民已经不再需要他们的代言人——公共知识分子时,公共知识分子就会退出历史舞台。当然这个黄金时代越早到来越好,也许永远也不可能到达。因此当下社会是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需要他们对违反社会正义的事件进行关注和批评。换言之,捍卫真理和坚守正义应该公共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在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仍然有可能通过某种渠道发挥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在这方面,前苏联的萨哈莫夫和捷克的哈维尔提供了成功的典范。作为前苏联极权体制的持异议者和批评者,萨哈莫夫被驱逐出到 Gorki 市后不许回莫斯科。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他被从召回并受到欢迎。而哈维尔长期是以一个民间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对政府进行批评,指责它侵犯人权和剥夺公民自由,呼吁建立尊重人权的国度。他创作的戏剧无法公演。但是他坚持不懈地努力。作为著名的七七宪章的发起人之一,1989 年哈维尔成为捷克总统。当然今天我所提到的都是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著名知识分子,但是我想作出说明的是公共知识分子并不等于著名知识分子,更多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名不见经传的公民。评价公共知识分子的客观标准决不是他的知名度,而是他是否遵循内心的道德准则对关系到公共利益的问题进行反思和批评。只有这样,公共领域才可能得以建立。

The Social Role of Public Intellectuals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of France

Jean-Philippe Beja

(International Relation Department of France)

Abstract: The need and being of public suggests real civil society's absence. When a society goes into ideal civil society ,that is to say civics do not need their mouthpiece ,public intellectual will leave the history stage. Of course we all hope the era appear just now although it will never come .So now we need public intellectual who pay attention to and critic the things which violate social justice. That is to say, defending the truth and justice is the professional morality of public intellectual.

Key words: public intellectual; Marxism; specialization

收稿日期: 2005-04-23

作者简介: 白夏先生为法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担任过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科学部主任